

治理區議會亂象終究要靠法治

【議事論事】
徐若曦

中西區區議會早前兩度召開特別會議，民政事務專員梁子琪均因為議題並非地區層面事宜、不符合區議會職能而帶隊離場。官員從區議會離場本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梁子琪離場卻具有標誌性意義，因為據報道當局上月中向各政府部門及18區民政事務總署發出內部指引後，首次有民政事務專員循規離場。

據媒體引述的指引內容，當區議會討論議題屬全港性質，或與司法和刑事程序有關時，官員可缺席會議。政府各部門須根據實際需要先向民政事務專員建議如何處理有爭議或可能越權的議程，專員亦可就相關法律問題諮詢律政司。

梁子琪根據指引帶隊離場是合規合理。相反，反對派區議員指責對方疏忽職守及濫用職權，根本站不住腳。不過，事件亦令人反思區議會不能討論全港性議題的法律依據是否充分？是否應對地區層面議題和全港性議題作出更清晰界定？為什麼不允許本屆區議會討論政治議題？

《區議會條例》第61條規定，區議會職能之一是就四個方面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其中包括「影響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人的福利的事宜」和「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用」。從字面理解，條例確實沒有明確界定區議會可以向政府提供意見的

事宜是地區議題，還是全港性議題。另外，翻查相關資料，過去幾屆區議會都討論過一些屬於全港性質的敏感政治議題，包括基本法第23條立法、政改、「一地兩檢」等，只是政府當時並未阻止。

政府修訂12年未有更新的內部指引，為官員出席區議會保駕護航，為阻止反對派在區會恣意妄為訂立規矩，已經開了一個好頭。上述問題，或許政府在準備推出指引時有過研討，或許政府根本沒有考慮，但是社會上有人表示關注，有人產生誤解，也有人趁機炒作，對政府的政治智慧是個考驗，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向公眾講清楚。接下來，各區議會仍會提出五花八門、有可能越權的議題，建議政府增強公開性和透明度，主動向公眾解釋處理區會爭議議程的理據，釐清地區和全港性議題定義，以確保政府指引作用最大化，逐步遏制區議會議事亂象。

應修改完善《區議會條例》

政府與反對派把控的區議會關係陷入僵局已經8個多月，政府官員恩威並施都無法改變反對派只反對不建設、為反而反的本性。戴耀廷早前又在報章撰文，指出「民主派」現有的優勢在地區，倡議組成地區議政平台，與官方機制平行運作云云，特區政府必須高度關注反對派的新動向。可以想見，未來幾年區議會將

繼續充當反對派與政府政治對抗的重要平台。政府須做好與區議會打持久戰的準備，抓緊研究依法治理區議會的政策舉措。

首先，拓寬對區議會監督的途徑。2008年，時任申訴專員曾建議將區議會等8間公營機構納入申訴專員職權範圍，而政府未予採納。本屆區議會在反對派把控下為所欲為，從申訴專員公署對「行政失當」的定義來看，濫用職權、厚此薄彼、不按程序辦事等，與區議會的表現都能畫上等號。建議政府研究修改申訴專員條例，將區議會納入申訴專員調查範圍。

其次，修改完善《區議會條例》。香港國安法第六條規定，香港特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第三十五條規定，任何人經法院判決犯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即時喪失參選或者出任公職的資格。建議《區議會條例》相應增加區議員就職時宣誓效忠的規定，並補充有關區議員違法的法律責任等內容。

第三，檢討區議會角色和定位。政府曾於2006年就區議會角色、職能及組成進行過檢討，十幾年來，香港社會以及區議會組成、結構和作用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很有必要重新審視區議會的角色，本屆反對派把控區議會導致地區管治混亂，政府更需盡快啟動檢討程序，開展廣泛公眾諮詢，深入探討區議會定位及發展路徑。

資深評論員

地方政體豈有「三權分立」



教育茶餐廳
何漢權

近日，有參與教育局「專業諮詢服務」的教科書出版商，修訂高中通識教科書，修改了香港實行「三權分立」的內容，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公開指出，香港沒有實行「三權分立」。

教科書對師生互動來說是重要媒介，資料正確與否，直接牽涉知識的傳授，要傳授真知識，就必須從有根有據的事實着手，當老師掌握事實後，再運用多元方式因材施教，用心用力引導學生，日久見真章，真知識將會內化成智慧，師生都受用無窮；相反，若傳授蒙混過關、言過其實、以偏概全的偽知識，再加上教師的個人偏見與偽知識相互摻雜，即使一堂課亦會貽誤學生一生，一學年過去，透過摻雜錯誤內容的教科書，師生就會將錯誤加疊，最終是積錯難返，觀念難以改變，迷途難以知返。

學問的承傳必有五部曲，此即「擺事實」、「講道理」、「說感受」、「明思辨」、「向前看」，一步跟一步，有序踏步，不能錯亂。

「事實」先要放在首位，繼而通過掌握事實，再坦承的說出道理來。回歸前後有哪一條法律說明香港是實行「三權分立」？由港英年代到特區政府，香港都是實行行政主導。回歸前港督擁有絕對的權力，可隨意操控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這是人所共知的。而港督只聽命於英倫政府，英倫政府又擁有香港的司法終審權，如此，三權怎樣分立？

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一國」的主權在前，作為一個地方政府，怎可能享有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權，更遑論「三權分立」？

就立法權而言，這絕非香港立法會的專利，早前公布實施的香港國安法正好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的全國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後，由特區政府刊憲就可在香港公布實施。這就說明，反對派高呼香港是實行「三權分立」，無疑是痴人說夢。

反對派硬要說香港特區行「三權分立」政治體制道理何在？他們提出的所謂「道理」，有如浮沙般空泛膚淺，由此而來的「感受」更是理不正氣不壯，充其量只能呈現個人想當然的情緒宣洩。再難期望能有「明思辨」的學問嚴肅辯證過程出現，更不會產生具建設性「向前看」的通識致用之學了。

教學專業是碰到誤區，敢於抽離與更正，是學界持份者的共同責任。教育局局長說明回歸前後的制度都不是「三權分立」，更正通識教科書內容，無疑是走上專業盡責重要的一步。

法庭無信 法治危矣

【新聞背後】
卓銘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刑事恐嚇記者案，法庭早前裁定案件表證成立，但至前日，裁判官卻裁定黎智英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

從不少人對判決結果感到不滿可見，香港司法機構已經越來越難取信於公眾，尤其近年來「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的情況屢見不鮮，很多被控嚴重暴力罪行的疑犯，不是被輕判，就是被獲准保釋，而部分獲保釋者甚至藉機潛逃外地，逃避法律制裁。當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法律卻無法保障公義，試問如何讓市民信服？如何讓公眾繼續守法？

今年2月，當黎智英涉嫌刑事恐嚇及參與非法集會被捕時，香港市民無不額手稱慶，原因不只是警方作出拘捕行動，更多是由於一些過往以為有外國勢力撐腰就可逃過法律制裁的人，將要面對法律制裁，同時也是相信法官會作出公正判決。上月刑恐記者案被裁判官裁定案件表證成立，更讓人感到黎智英終於要為違法付出應有的代價，但案件的裁決，卻令人感到不忿。

所謂「表證成立」，其實就如字面意思，是指控方開案陳詞和傳召證人作證後，控方的證人口供和證據在表面上看來可靠和齊全，法庭原則上已經接納有關證據可涵蓋控罪中的所有元素，使案件可以繼續審訊。也就是說，裁判官在當時也同意控方證人（事主）和其證供並非不可靠或沒有根據。

然而到了前日，裁判官卻以事主被恐嚇後仍然「笑呵呵」、多次去信律政司要求檢控、不能肯定事主的適應障礙症與本案有直接關係為由，認為其不誠實而且不可靠。既然裁判官認為證人不可靠，那當初為何又要裁定案件表證成立？裁判官倒不如從一開始就判定表證不成立，就不必浪費時間和公帑審理該案了。

再者，2013年「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同樣在旺角被一名退休男子刑恐，被告當時辯稱自己因「好躁」、「一時衝動」而失言，但裁判官最後仍判處其罪名成立，原因是事主是否真受到驚嚇並非重點，法庭必須保護任何人，尤其是公眾人物不受威嚇。明明有這樣的案例，何以7年後的本案，法官卻反而因黎智英向記者說「搵人搞你」是因發脾氣衝口而出，而宣判其無罪？難道記者就不受法庭保護嗎？還是因為黎智英是公眾人物才獲法庭保護？

這正是判決與公眾期望有如此大落差的原因。原本市民都期待法庭可以有一個客觀、公正的判決，惟法庭似乎卻選擇息事寧人，實在不得不讓人質疑，黎智英其他涉及的控罪，是否也會有一樣的結果？煽動、參與非法集會、詐騙、觸犯香港國安法，一個涉及罪狀多不勝數、相關罪證罄竹難書的人，如果連一條罪都入不到，法庭的威信還存多少？難怪奉公守法的市民會感到氣餒。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日前在報章撰文，批評過去一年法庭有份創造街頭混亂的社會環境，理應保護大多數人的法律被破壞，卻沒有任何懲罰。不料文章刊登當天，即傳出黎智英被判無罪的消息，可謂一語成讖。司法獨立是香港其中一項優勢，確保法庭不受任何干擾作出裁決。但如果法庭的裁定再無法取信於公眾，市民還可以相信香港的司法獨立嗎？香港還是個法治社會嗎？

深圳在前進 香港不能停



知微篇
周八駿

深圳經濟特區40年所經歷的變化，抵過香港一個半世紀。今天，深圳經濟總量超過香港，創新和科技產業領先香港，深圳證券市場市值與香港差距不斷縮小。作為一個國際著名大都市，深圳的風貌不亞於香港。

深圳經濟特區邁入第5個10年之際，中國走向新發展階段。國家主席習近平8月24日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從2021年開始「『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

在新發展階段，深圳肩負重任，不僅是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而且，被中央賦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要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新格局，率先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質量要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將是世界一流，文化軟實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質量發展要成為全國典範，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世界領先，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成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到本世紀中葉，深圳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先進城市之林，成為

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

從獅子山頂眺望，一千三百四十萬深圳居民已建立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機制，正團結一心，為實現光榮歷史使命而奮鬥。

對比深圳，香港應當感到慚愧。不是因為香港的經濟總量被深圳超越，那是遲早的事情，非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所能阻止或避免。應當慚愧的，是至今香港社會尚未形成香港必須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主流共識。

故步自封必落後於人

在建制中，不少人，包括身處高位者，口頭承認香港必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行動上主辦了不少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的研討會，政府和商會、專業團體組織了一個又一個考察團，到大灣區各城市、到「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然而，至今當局沒有提出任何融入大灣區的方案或時間表，商會和專業界別則偏重向中央要提供優惠政策讓他們在大灣區取得商機和發展空間。

「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則一貫反對和阻撓。儘管他們在美英指使下所發動的「黑色革命」已被香港國安法遏止，但是，他們還

不死心，當前以反對中央支援特區防控疫情為切入點，企圖繼續分隔香港與內地。值得重視的是若干以專家面目出現的「拒中抗共」分子，以防控疫情為藉口，企圖長期嚴格限制香港與內地人員往來。問題是，香港高度依賴服務業並且必須高度開放，嚴格限制香港與內地人員往來，切斷了香港服務業的「活水」，使遭受了逾一年「黑色革命」蹂躪的香港，又遭遇百年一遇疫情和前所未有衰退相互惡化的折磨。

深圳河北，是向更高發展階段前進。深圳河南，是在痛苦中蹉跎歲月。對此，特區政府必須率先醒覺。

香港特別行政區23年半的經驗顯示，在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基本元素的同時，必須實行改革。總體看，正如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指出，疫情暴露既有市場經濟主體企業制度嚴重缺失，必須改革，「改革目的就是構建一個以人為本，更公平、公義、包容、共贏、和諧及可持續的社會經濟模式。」

具體看，香港既有公共衛生體制需要改革。目前，香港公共衛生體制是由食物及衛生局領導醫院管理局和衛生署；前者負責政策制訂，後兩者負責政策執行和公共衛生系統運作。面對百年一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暴露政策制訂、執行和運作明顯滯後，至今，在病毒檢測、傳播鏈追蹤和阻斷等三個環節都存在著明顯缺失。必須從改革入手，切實加以克服，香港才能擺脫疫情反彈與衰退加劇之惡性循環，才能不落後於深圳。

資深評論員、博士

「韓寶生復活」和「DNA送中」

【有話要說】
張敬偉

疫情陰霾依然籠罩香港的情況下，香港亟需的是疫情防控而非各種添亂。但香港近期出現了形形色色的謠言，反對派也變成了謠言製造機器。箇中原因依然是政治圖謀在作祟，更折射反對派的政治兇心。

反中亂港勢力利用所謂「8·31事件」在警方拘捕行動上加油添醋，編造出「太子站死人」的謠言，反對派的網上平台甚至詳細羅列「死者」信息，又在站外設置「靈堂」祭奠。警方認真調查後，發現所謂「死者」信息無一為實。更卑劣的是，其中一位「死者」「韓寶生」忽然「復活」，不僅讓這場大騙局成了笑話，而且他還曝光了自己被反對派利用而「不得不死」的內幕。一場反對派導演的政治謠言大戲變成了諷刺鬧劇。

反對派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透過各種文宣不斷散播謠言，部分腦子發熱的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寧信其有」的「真理」深信不疑，於是被煽動起來成為反對派的亂港棋子。「韓寶生復活」不僅揭開了反對派製造謠言的黑幕，還凸顯他們卸磨殺驢的品性。利用謠言激發民衆激情，從而讓民衆投向街頭暴力活動，就成為反對派慣常使用的政治手段，也暴露了他們陰暗的政治兇心。

儘管謠言一一被戳穿，但是反對派依然利用所謂的「8·31事件」，企圖讓街頭暴力亂象重演。而且，反對派利用香港國安法實施、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等編造更多謠言圖謀反撲。但事實不可辯駁、謠言難變真實，反對派的政治圖謀一旦大白於天下，就很難實現以謠言搞亂香港的目的。

「8·31事件」終究是笑話，被蠱惑的市民也開始認清反對派的真面目。被反對派害苦在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很多因此留下案底，甚至入獄。可見，謠言是害人的政治毒藥，而且會荼毒港人終生幸福。

「8·31謠言」被戳穿後，反對派並未停止編造謠言，當中最離譜的是聲稱特區政府展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是要「DNA送中」云云。

香港抗疫一波三折，究其根本原因，除了反對派搗亂，還有「黃醫護」拒絕配合政府防疫工作，更重要是他們蔑視、抹黑、拒絕借鑒內地的抗疫經驗。香港爆發第三波疫情以來，近半病例查不到源頭。在此情勢下，只有實施普檢找出隱形患者，斬斷病毒傳播鏈才是治本之策。

為此，中央應特區政府請求，出人出錢協助香港特區展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這對香港市民本是天大好事。然而，「黃醫護」基

於私利，對內地專家的資歷和專業資格、試劑品質、實驗室安全作出毫無根據的詆毀，對普檢潑潑水，誣稱是「利益輸送」、「黑箱作業」云云。黃之鋒之流更患上妄想症，妄稱「中國（內地）實驗室正收集香港人DNA」「DNA會被送到新成立的國安機構」「普檢目的是建立一個DNA數據庫，可用於鎮壓香港示威」云云。

「DNA送中」和「8·31謠言」一樣，明眼人看得出是缺乏常識的謠言。核酸檢測是成熟的醫學手段，抽取的樣本及檢測病毒的程序會涉及測試者的細胞及其中的核糖核酸，測試劑並不能為測試者的基因作任何識別和排序。而且，現場負責採樣的全部都是香港醫護人員，樣本流向設置了GPS定位系統追蹤，樣本只有編號沒有個人資料。

不普檢難以遏制疫情肆虐，香港自身又缺乏普檢能力。中央出錢出人協助特區政府展開普檢，卻被反對派污衊為「DNA送中」，看來反對派就是要讓香港疫情肆虐下去，讓香港人時刻生活於疫情痛苦和恐怖不安之中。如此不把香港市民福祉放在眼裏，如此歇斯底里地對抗國家、對抗中央，香港反對派製造謠言的政治兇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